在近日举行的石鼓书院大讲坛·国学讲座中，市委党校讲师彭志刚通过衡阳保卫战这段历史，讲述衡阳人骨气硬、敢担当、敢作为、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敢为人先的精神风貌——

衡阳保卫战正是衡阳“精神元素”的生动体现

■本报记者 许 珂

衡阳是一座抗战名城，在悠久灿烂的历史长河中，衡阳人不断超越、勇于担当、有勇有谋、血性刚强、百折不挠、善于创新，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感天动地的英雄业绩，彰显着浑厚、独特、辉煌的衡阳“精神元素”。

衡阳战略位置显要

1944年，日军为了逆转其在太平洋战场上急遽失利的厄运，内心极度焦灼的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杉山元上将上奏日本天皇，提出了“打通大陆作战”的设想，并得到了天皇裁可。后来，日本大本营遂将此作战命名为“一号作战”，其主要目的是摧毁在中国大陆的美空军基地，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队。

日军称这次作战“确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规模最大的一次一连串的大军作战。”这次作战，无疑也是已成强弩之末的日军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跳”。

而衡阳这一地域，战略位置极为重要。

1944年8月12日《解放日报》的一篇社论就曾经谈道，“衡阳是粤汉、湘桂两条铁路的联结点，又是西南公路网的中心，它的失守就意味着东南与西南的隔断，和西南大后方受到直接的威胁。”

当时，衡阳的飞机场是我国东南空军基地和西南空军基地之间的中间联络站，它若失守就使辛苦经营的东南空军基地归于无用。从福建建瓯空袭日本的门司，航空线为1425公里，从桂林去空袭则航空线要延长到2220公里。衡阳位于湘江和耒水合流处，依靠这两条河，可以集中湘省每年输出的稻谷3000万石，还有丰富的矿产于此集中。这些对大后方的军食民食和军事工业是非常重要的，它的失守会加深大后方的经济危机，反过来却给了敌人以“以战养战”的可能性。

由于衡阳战略位置的显要，自然而然地使它成了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所必须夺取的目标。所以，重庆国民政府方面和蒋介石本人对衡阳一战也甚为关注。

1944年5月28日晚，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驻守衡阳的第10军军长方先觉，说：“此次会战关系国家民族存亡，衡阳得失尤为此次胜败关键，希望安心死守，余必督促陆空助弟完成空前大业。”可见，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方面也是把衡阳一战看成是“关键”，他们也是不愿意轻易放弃这座不大却非常重要的古城的。

1944年6月23号下午1点，日军第68师团所属的第64、116两个大队，从泉溪强渡耒水，中日双方正式交战，衡阳保卫战正式打响。

浴血苦战四十七天

“东西两站人山人海，扶老携幼、肩挑手提，大人喊叫声，小孩啼哭声，一片混乱凄惨景象。不但车厢内挤满了人，车厢上亦有人满之患。远处望之，有如一条条死蚯蚓爬满了蠕动着的蚂蚁，惨不忍睹。”抗战老兵葛先才回忆当时的情景，“当时，方将军下命令，要我们坚守‘三不打主义’，即看不见不打、瞄不准不打、打不死不打。”

可以说，衡阳保卫战是抗战8年之中，作战时间最长、敌我双方伤亡官员最多、程度最为惨烈的一场城寨争夺战。

首先，从时间上来看，衡阳保卫战打了47天，而闻名于世的台儿庄大捷只打了14天，长沙第3次会战每次也只打了三四天。台儿庄等战役，当时都是三面受敌，后方补给线始终畅通，特别是外围应援之友军都较围攻之敌强大，故能展开反包围，取得内外夹击之效果。不像当时的衡阳，四面被包围，孤军奋战，既没有援军到达，又没有任何武器、弹药、粮食、药品补给。正如当时的新闻界评论道：“弹丸之地的衡阳，纵横不过数十里，陆上有强敌四面包围，空中有炮弹毒气烧杀，处此危城，坚强的守了47天，真是大不容易。”

其次，从敌我双方伤亡的数字来看，可以感知双方战力之悬殊，我军守备之艰苦达到何种程度。

奉命守备衡阳的国军第10军，只有7个团及配属的暂编第54师之1个营，共16275人的兵力。从6月23日日军开始进攻衡阳到7月底，第10军伤亡非常惨重。军部直属部队伤亡2/3，预备第10师伤亡90%，第3师伤亡70%，第190师仅剩有400余人，各部中下级军官几乎全部伤亡，每一次战斗均要连升数个营长、连长。如在五桂岭争夺战中，第3师第8团半天之内晋升5个营长，均先后阵亡。至衡阳保卫战全部结束时，参加守城的国军第10军将士不足17000人，死伤15000余人，其中阵亡7600人。

而当时围攻衡阳的日军是其第11军团第68师团和第116师团及一个独立旅团。据日军资料记载，到7月底，68师团和116师团所有战斗序列中的步兵中队，平均只剩二十多个人。日军一个中队约200人左右，也就是说，经过一个多月的进攻，日军两个师团近4万人，损失了战斗兵员80%以上。日军攻占衡阳的伤亡人数大约有3万人左右，是我方伤亡人数的一倍。8月初，在大本营的压力下，日军第十一军团横山勇司令官亲率第3、第13、第27、第34、第40、第58等师团，加上68师团和116师团残余，共计11余万人，对衡阳城实施全面包围进攻。8月4日发起总攻，仅一天之内，就向衡阳城发射了四万多发炮弹，而进攻的日军依然遭到我军的顽强抵抗，伤亡难计。

抗战胜利后，以当时衡阳市参议会议长杨晓麓等五人组成的“请建衡阳为抗战纪念城”代表团，赴南京向国民政府呈递的请建衡阳为抗战纪念城文，就这样写道：“窃维抗战8年，大会战22次，而相持较久，关系至巨，贡献最大而牺牲最烈者厥为衡阳一役……然以配合作战，构筑工事之民夫，葬身枪林弹雨中者，即达3174名，而直接被杀伤、间接因饥病以致死亡者，又逾35103人，烧毁房屋45697栋，推毁大小工厂183家，荒废田土375000余亩，损失财产82204万余元，论功位于苏联斯大林格勒，破坏程度比绪德之汉堡，尚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处，以故中央宣慰史刘文岛，美大总统代表哈里逊等，先后莅衡视察，咸言灾害惨重，甲于全国，载诸报章，共闻共见。”

抗战精神永流传

可以说，衡阳保卫战作为一场具体的战役，其历史作用是巨大的，甚至是中国抗战史上绝无仅有的。

其一，衡阳保卫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直接延缓了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的步伐进程，加剧了日本内阁的危机，并最终导致了东条内阁的垮台，粉碎了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有效实施。

衡阳一战中，敌人伤亡惨重，其中“以京都、大阪为中心的两个师团几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在此之前，日军攻占到星州和马来西亚，伤亡却只有1289人；扫荡印尼全境，一共只用了3个师团另1个旅团，损失了2624人。而在“衡阳攻城战”中，日军先后投入5个步兵师团、1个独立旅团和1个重炮兵部队、飞行师团和大量水陆辎重部队，仅战斗部队就达11万人，与我第十军鏖战，旷日持久达47昼夜，而伤亡人数，竟在上述诸役伤亡总数5倍以上，无怪乎日军视此一战役为“苦难的战役”。

同时，衡阳一役还加剧了日本内阁的危机。由于衡阳久攻不下，致使日“派遣军甚感不安，大本营之不满逐渐达到极限”。7月16日，日军向衡阳发动第2次总攻再度挫败时，派遣军总参谋长松井太久郎中将来到长沙第11军司令部，传达大本营要求尽快攻占衡阳的命令，并力劝横山勇将其主力投入衡阳。当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焦头烂额，日本国内对一身兼任首相、陆相和参谋总长的东条英机极为不满，东条深盼陆军在中国战场表现佳绩，以维持他的统治地位。如果衡阳之战继续胶着，他的内阁就岌岌可危。此时，日军所占的南太平洋塞班岛失陷，再加之日军攻占衡阳继续受挫，1944年7月18日，东条终于被迫辞职下台。

其二，衡阳保卫战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展示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捍卫祖国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精神。

当时重庆的《扫荡报》给衡阳守军的致敬书中这样写道：“这40天来，敌寇不断用强大的兵力猛击你们；甚至滥用毒气，做出不齿于人类的野蛮事。而你们装备劣势，给养不足，援军接应困难，负伤缺乏医药，各种条件都不如敌人。你们用血肉抵挡敌人的炮火，用血肉保卫祖国的名城，给四万万同胞吐了一口闷气！有了你们这一战，才觉得做中国人是最高贵的。后方的同胞对你们真是说不尽的感激，说不尽的崇敬！”当时的重庆《大公报》也发表社论称道：“衡阳虽已陷落敌手，衡阳守军的战绩尚在！衡阳47天是索得敌军巨大的代价，衡阳47天是在明耻教战。全国人都应惭愧对国家太少贡献；而凡是中华军人必更普遍反省自己的决心与努力是否也如同衡阳守军，我们以为衡阳之战贡献至大，不仅向敌人索取了代价，也给中国军人做了榜样。”

抗战胜利后，南京政府把衡阳定为抗战纪念城，蒋介石亲自题写“衡阳抗战纪念城”碑铭，并亲自颁书《衡阳抗战纪念城命名典礼训词》。1947年8月10日，衡阳抗战纪念城在岳屏山顶举行了命名奠基典礼。

其三，衡阳保卫战为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印缅战场争取了时间，牵制了日军，为我军在西南地区进行全面防御部署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同时，对于提升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阵营中的地位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衡阳抗战精神的精华在于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爱国精神，百折不挠、喋血敢死的牺牲精神，存亡激智、智勇奋发的创造精神。”最后，彭志刚用三句话鼓励所有衡阳人，“走出低谷，需要万众一心；重振辉煌，需要奋力拼搏；进入强市，需要开拓创新。”

品读经典

举贤治国

《晏子春秋》是一部记录春秋末期齐国名相晏婴思想言行和政治主张的名著。《晏子春秋》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其中晏婴的人才观于当今社会识别人才、选拔干部具有参考价值。

齐景公问晏婴治国理政的关键。晏婴回答：“举贤以临国，官能以敕民，则其道也。”意思是说举荐贤良之人来治国、授官给有能力的人管理百姓，是治国的关键。这是基于春秋时期，大国争霸、小国自保的过程中，得到贤良之才的国家就会取得优势地位而得出的结论。当时身居齐国要职的晏婴试图帮助齐国重振往日辉煌，希望君主能够认识到贤良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作用。齐景公了解到贤良对于国家政治重要性后，如何发现和挖掘贤良之才，成为困扰他的一大难题。晏婴经过对人才规律的摸索和实践中对人才规律的运用后，发现识别人才的关键在于观察此人的交游范围和言行举止。正如晏婴所说：“观之与其游，说之与其行”。从具体来看，贤良之才在施政的时候具有以下特征：“其政，刻上而饶下，赦过而救穷；不因喜以加赏，不因怒以加罚；不从欲以劳民，不修怒而危国”。意思是说他们在治政上严格要求官吏而宽抚百姓，赦免过失而救济贫穷；不因个人的喜欢而增加奖赏，不因个人的愤怒而加重惩罚；不放纵自己的嗜欲来劳损百姓，不结怨于诸侯，使国家危险。在个人品行考验与施政方略检验方面能够做到克己修身与仁政爱民，是观察达到贤良标准的关键。

如果人才在这些方面都达标了，从更深层面来讲，还要考察人才对待职位俸禄的态度，才能更好地区分贤良与否。晏婴说：“夫上士，难进而易退也；其次，易进易退也；其下，易进难退也。”这句话是在强调贤良之人难于进身为官却容易隐退，仅次于贤良之人的容易进身也容易隐退，不贤良之人容易进身却不愿隐退。进身仕途，是否能够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真正实现为民行使权力目标，然后，以引退形式对权力进行告别，这是古人为宦者追求的最高境界，这其中有政治理想、为民情操、自律要求的综合作用使然。在当代社会，在被查处的干部中，有一些干部就是对百姓严苛、对贫穷无视、放纵自己的欲望、破坏社会稳定的典型；有一些干部为了谋取更大权力，更是挖空心思、长期钻营，最后跌了跟头。这些都需要我们借鉴晏婴察用贤良方法进行避免和预防，用来帮助我们更好净化干部队伍、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用典释义

非诚信 无以取亲于百姓

凡人之情，莫不爱于诚信。诚信者，即其心易知。故孔子曰：“为上易事，为下易知。”非诚信无以取爱于其君，非诚信无以取亲于百姓。故上下通诚者，则暗相信而不疑；其诚不通者，则近怀疑而不信。

——《臣轨》

■译文

喜欢有诚信的人，这是人之常情。有诚信的人，容易知道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所以孔子曾说：“一个有诚信的人，居于上位时，可以使居于下位的人感到自己容易侍奉，而居于下位时，可以使居于上位的人感到容易了解自己的内心想法。”为人臣者，如果没有诚信这项品质，就不容易得到君王的青睐，也不容易得到百姓的亲爱。君臣之间如果以诚相待，那么他们的言行就会不谋而合且无猜疑，如果不能以诚相待，那么就会彼此怀疑、无法相互信任。

■解读

这段文字选自武则天撰写的《臣轨·诚信章》，儒家有所谓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信是中国人最为重视的道德标准之一。

这段文字开头即说一个有诚信的人，是很容易了解他的内心真实想法的，他所承诺的就是他即将付诸实际的，而他所承诺的也一定是与他的人格、品质相符的，一个有诚信的人不行欺骗之事，也不为虚妄之谈。

这段文字引用的“为上易事，为下易知”，其实出自《礼记·缁衣》，相传孔子曾删述“六经”，其中就有《礼》，但《礼记》却是后人的作品。“记”是对“经”进行阐释与解读的作品。

孔子在《论语》中多次论及“信”的重要性。如孔子曾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輗”“軏”指的都是古时车辕前端和横木衔接处的销子，没有这个关键的构件，车子是无法行走的。一个人没有诚信，就像车子没有“輗”“軏”一样寸步难行。又如子贡曾问孔子，在粮食充足、兵力充足、百姓诚信这三者间，如果必须去掉一项，那么您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可以去掉兵力充足这一项。子贡说如果还要去掉一项呢，孔子说那就去掉粮食充足这一项吧，最后只留下了百姓诚信这一项。孔子之所以留下这一项，是因为他认为“人无信不立”。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家风传承

王祥风骨与琅琊王氏

王祥去世时留下五条家训：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

琅琊王氏为中华望族，在汉唐期间产生了600多位历史文化名人、90余位宰相，24史中有3部历史列传居首者为琅琊王氏：王祥为《晋书》列传首卷，王弘为《宋书》列传首卷，王俭为《南齐书》列传首卷。东晋以后兴起于江左的一支，系王祥、王览的子孙。王祥不仅以美好的孝行为这个家族奠基，他的言行也成为后世子孙恪守奉行的榜样。

王祥去世时曾留下五条家训：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为人表里如一、有始有终，信守诺言，不圆滑世故，这是诚信；把荣誉和成绩让给他人，过失和责任勇于担当，谦逊低调、任劳任怨，此为“推美引过”；孝有大小，孝敬父母只是小孝，而提高修养、建立功业以彰显父母养育教诲之德，才是大孝，这是对传统孝道思想的升华；兄弟团结，家族和睦，此为悌；面对利益懂得谦让，生活保持清廉俭朴，上述五条便是王祥所坚守的“立身之本”。

王祥生逢乱世，母寡弟幼，继母朱氏多次想杀死他，但他却孝敬继母三十年如一日，体现了以德报怨、顾全大局的宽厚度量和善始善终、任劳任怨的坚韧品格，这种孝行是在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之后磨练出来的人性光辉，具备感发人心、促人向善的精神力量，不仅感化了继母的狠毒之心，还引导了弟弟王览的善心。王览为了救护王祥不惜“争鸠舍生”，兄弟二人可谓患难与共，互相成就。王祥担任徐州别驾后，移风易俗，涵养正气，以博大的胸怀和气度去感化一方百姓。王祥的一生很好地诠释了这一家训的内涵。

王祥家训对其子孙产生了重大影响，史书“其子皆奉而行之”。琅琊王氏阖门孝睦，王徽之愿意替代弟弟王献之而死、谢道韫帮助小叔王献之辩论、王僧虔培养侄子王俭，他们爱护家人，情同知己，真挚之情让人感动！这是对王祥“兄弟怡怡，宗族欣欣”家训的坚守。琅琊王氏不以财富为人生追求的目标，西晋王衍“未尝谋货利之事”，东晋王导“素寡欲，仓无储谷，衣不重帛”，刘宋王弘“虽历藩辅而不营财利，薨亡之后，家无余业”，他们虽然位居宰相，也不改清廉俭朴的生活。梁代的王志信守承诺、老成厚重，他担任东阳太守时冬至日释放重囚回家，“过节皆返”，王志兄弟子侄皆笃实谦和，时人号为长者，很好地践行了王祥“言行可覆”的诚信之道。至于“推美引过”，功绩之大者无过于王导，作为东晋的开国宰相，王导制定了“谦以接士，俭以足用，以清静为政，抚绥新旧”的施政方针，他礼贤下士，团结南北士人，组建以“百六掾”为主的东晋朝士集团，他还在历次政治变乱中谦逊谨慎，扶危定乱，稳定了东晋朝局。

陈寅恪先生《论东晋王导之功业》：“王导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得以独立，文化得以延续，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谦逊低调，对权势存有敬畏之心，王僧虔也是很好的典范。齐武帝曾任命他为开府仪同三司，因为侄子王俭已经担任此职，“一门有二台司，实可畏惧”，于是王僧虔以“君子所忧无德，不忧无宠”为由，坚决推辞，可谓激流勇退。晚唐诗人孙元宴称赞道：“位高名重不堪疑，恳让仪同帝亦知。不学常流争进取，却忧门有二台司。”

“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入仕的目的不是为了稻粱谋，而是为了实现士人拯时济世的人生理想。王祥能坚守原则，反对结党营私。王祥去世后，来吊唁者“非朝廷之贤，则亲亲故吏”，无杂吊之宾，他的族孙王戎称叹曰：“太保可谓清达矣！”王羲之出仕，反对结党营私。永和四年（348年），司马昱、殷浩任命王羲之担任护军将军，目的是想借助他的社会影响打击桓温。王羲之并没有站在党派的立场，而是从东晋政治的大局出发调解两派的矛盾，他体恤百姓的艰辛，减省赋税，开仓济民，其《深情帖》云“行其道忘其力身”，其《断酒帖》云“百姓之命倒悬，吾夙夜忧”，这都体现了他不计个人利害的忘我精神。

王羲之的政治使命感和历史担当引起了后人的共鸣，元代赵孟頫评价云：“右将军王羲之，在晋以骨鲠称，激切恺直，不屑屑细行，议论人物，中其病十之八九，与当道讽谏无所畏避。发粟赈饥，上疏争论，悉不阿党。凡所处分，轻重时宜，为当晋室第一流人品！”

（据央视网）